

讲述

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与毕节试验区建立

1987年8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 考察金沙、黔西、大方、毕节4个县。考察中,胡锦涛同志作了指示:贵州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必须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他设想,将毕节地区作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探索一条喀斯特山区的科学发展之路。他要求毕节地委、行署抓紧对区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争取在1987年年底前提出初步的方案,向省委作正式汇报。

毕节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按照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并组建工作组进行区情调研,于1987年12月初完成了建立毕节试验区有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在之前的10月,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在贵阳召开相关省区智力支边座谈会,胡锦涛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许多党派中央领导和著名专家呼吁,把大西南岩溶山区的开发治理列入国家科学研究的课题,选择一个地区帮助制订发展规划,探索解决喀斯特连片贫困地区生态恶化、人口贫困、粮食短缺、能源匮乏问题的新路子。这一呼吁与贵州省关于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构想基本吻合。

1988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和设想,得到省委“一班人”的赞同。3月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问题。会议同意胡锦涛同志关于毕节地区的基本特征是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准确判断,一致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并委托时任省委主任苏钢,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部长齐学率调研组,指导毕节地委、行署制订、修改、完善试验区工作方案,上报国务院审批。

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北京的贵阳饭店邀请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家民委的负责人座谈。胡锦涛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毕节地区区情以及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希望得到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支持与合作,呼吁大家以毕节为支边联系点。会上,经过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充分民主协商,确定毕节地区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联系点。

1988年5月,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出以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为组长的赴黔调研组一行17人来到毕节,开展为期13天的深入调研。调研结束后,调研组与胡锦涛同志以及毕节地委、行署领导深入交换了意见。调研组认为,在毕节这样的喀斯特山区建立试验区意义十分重大,是一项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不仅有助于突破长期形成的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且有助于为西部喀斯特地区经济发展积累经验,闯出新路。调研组回到北京之后,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调研报告,希望早日批准建立毕节试验区。并将带回去的录像带、照片向有关领导和专家展示,用真实生动的图片、画面直观展示毕节地区生态恶化的程度和人民生活贫困状况,取得广泛关注支持,对共同支持毕节试验区建设达成了共识,对促成毕节试验区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1988年4月8日,胡锦涛同志和省长王朝文带领毕节地委、行署的几位负责同志到北京,专程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汇报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有关事宜。4月11日,田纪云委托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召集国家计委、经开办、扶贫办、统战部、农业部、林业部、商业部、中国农业银行、国家烟草总公司等17个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毕节地委、行署的汇报。大家一致赞同建立毕节试验区。6月9日,国务院以“国办通(1988)38号”文件批复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1988年7月,为了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毕节地委决定由行署副专员王绪才带领智力支边办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汇报毕节试验区建立的情况及需求。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办公室胡德平主持汇报会。这次汇报会议定了三项工作:第一,建议毕节试验区制定“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央智力支边办商请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挂帅,组成专家组到毕节指导;待规划形成后,中央智力支边办在北京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论证。第二,根据常近时教授建议,由每个党派和工商联选派二名专家组成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具体帮扶毕节试验区的工作。第三,要求各党派、工商联进一步落实对毕节的支边项目,帮助引进人才、资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

1988年10月,钱伟长挂帅,常近时教授(农工党员)、李孝芳研究员(致公党员)、杨金和研究员(民盟盟员)、叶文虎教授(致公党员)、任华翼副教授(民建会员)、罗剑雄高级工程师(民革党员)为成员的毕节试验区专家组一行7人,在省政协副主席汪福清陪同下到达毕节,与地委、行署、人大、政协几家领导广泛交流意见,听取汇报并审阅毕节地区起草的规划,还实地考察了纳雍县姑开乡水土流失情况及毕节县小煤矿、小水电等。专家组对编制试验区规划的总体意见是:提出一份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总体规划,代之以原有的脱贫规划和其他规划。这个规划包括几个部分:农业与生态环境整治;地方工业与乡镇企业(原来没有这方面的规划);能源与交通;教育与人口。这4个部分在编制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相应分别编制子规划。

毕节地委、行署根据专家组的建议,组织了一个规划编写组,重新拟出编写提纲,进一步修订完善试验区规划。规划初稿送省委、省政府审阅,并邀请省直有关部门、党派领导和专家评审后,送北京请专家组进一步评审。毕节试验区规划编写组在充分消化、吸收专家组意见的基础上,对规划进一步作修改补充,几次征询了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意见后,最后定稿提请论证。

1989年4月28日至30日,在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指导下,贵州省委、省政府牵头在北京邀请了160多位领导和专家对毕节试验区发展规划进行论证,一致认为规划层次分明、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符合毕节地区实际,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建议毕节地委、行署认真组织实施。

1989年9月,“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顾问组”成立。顾问组长由钱伟长担任,常务副组长由农工党中央常委、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常近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纪珂、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民革中央副主席胡敏任副组长,成员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18位同志组成。专家顾问组成立29年来,充分发挥联系面广,知识密集等优势,对毕节市的发展建设提出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建议,促成一批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并促成东部十省区统战部对口帮扶毕节市。

(作者系毕节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



最后的武举人刘殿英

□ 翟显长

刘殿英(1854—1945),本名刘成南,“殿英”是其表字,人称“刘大老爷”,是曾经毕节刘氏家族的族长。光绪元年乙亥(1875)科,21岁的刘殿英考取了武举人——光绪五年(1879)“学官版”《毕节县志》“卷之五”(下)“选举门”(二)“武举”“光绪元年科”相关记载为:潘福,刘成南,秦克壮,钟鸿材,秦实颖,徐允文,丁光斗,范春华。乾隆、同治、光绪三版《毕节县志》的记载均表明,这是毕节最晚的一次武举人情况记载。与刘殿英同科考中武举的其他7人,大多湮没无闻,没有更多资料记载。

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一共举行了约500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三级考试,通常是每3年举行一次。考试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才貌、言语等科目,分三场进行:第一场,二场统称为“外场”,主要考“射”“御”两种技能;第三场被称为“内场”,考武经,即考文,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考试。考武举人比考文举人还难。刘殿英年纪轻轻就能脱颖而出,在省级考试中得中武举人,表明他除了一身好武艺,文才也不错。

在毕节城的刘氏大家族中,刘殿英属于以来自汉高祖刘邦发迹之地河南南阳的刘起较为始祖的这一大支系,是“起儒玉仕水延昌,南郑传来世系长”这14派行中的第八代。与“刘孝子”“刘京官”“大夫第”同支。

据刘氏家族族谱资料,刘殿英考中武举后,曾诏授“武功将军”,是毕节城声威烜赫、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刘殿英思想开明进步,身为清朝武举人却支持反清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拥护蔡锷民主共和——

1911年,刘殿英57岁,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贵州贵阳宣布光复,刘殿英曾出任毕节团防“管带”,带领民兵训练、巡逻,维护毕节社会治安。1913年,周素园在北京任参议院秘书及稽勋局调查员时,为贵州省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有功人员作《稽勋表册底稿》,“丁”等功勋中有刘成南的事迹简介:“毕节光复后,刘殿英,保卫地方,推成南为管带。与黄占春(时毕节哥老会头领)昼夜督巡,维持秩序,地方赖以宁谧。”而在同样是“丁”等功勋的“周培藻”(素园三哥)词条中,与刘成南相关的表述更为详细:毕节光复后,四川尚未反正。闻清更有由永宁进攻毕节之说,川滇边界土匪亦时虞蠢动。周培藻等乃实行团练,募足三百人,推刘成南、黄占春管带教练之;需饷则由葛亮曾(威宁巷“葛家龙门”葛子惠进士侄子、义子,时毕节商界领袖)、杨樾林(百花山“杨家公馆”杨汝偕进士长子,科举秀才,从日本留学归国,毕节光复后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担任募集,合力维持。地方赖以宁谧。

1916年1月29日至31日,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领其司令部并四个支队进驻毕节城,刘殿英时任县团防局长。29日当晚,刘殿英同县知事聂树楷、电报局局长缪桂卿、商会会长宁焕卿、“少白楼”老板名厨李春庭等官绅,到龙峰山下三省交界最著名酒楼“少白楼”,为蔡锷、朱德等护国军将领接风洗尘。次日晚间,蔡锷、朱德等护国军将领,就在刘殿英家新建的“公恕堂”里回请毕节绅、商、学、农各界代表并合影留念。“公恕堂”刘殿英、“宁家龙门”宁焕卿及其后人,把这张照片当“传家宝”一样珍藏多年。

护国军在毕节的短暂停留,还留下了一段“刘大老爷”用“捞渣”为朱德治愈战马的传奇佳话。民国初年,刘殿英到京城做生意时,结识了一位身陷困境的人,并对其进行扶助;这人无以为报,便传授刘殿英一味名叫“捞渣”的特效药及其炮制技艺。刘殿英回毕节后,用“捞渣”治愈了不少百姓的眼疾,在毕节城,“刘大老爷的捞渣”远近

知名。朱德时年29岁,任护国军第一军第六支队队长,在司法路和广惠路交界处“城隍庙”指挥部内办公,在南门口威宁街宁焕卿家“宁家龙门”住宿。由于从云南入贵州十几天马不停蹄的长途跋涉,朱德心爱的战马出现了视觉障碍。朱德接受宁焕卿的建议,找“刘大老爷”讨“捞渣”为战马“点”眼睛,果然药到病除。朱德特别高兴地向“刘大老爷”再三致谢。后来,朱德率部入川讨袁,其坐骑在赤水河畔雪山关前再次出现视觉障碍,又专门派人赶回毕节,再次向“刘大老爷”讨要“捞渣”。

在毕期间,得到刘殿英及其下属的大力协助,护国军在城内小校场搭成了“阅兵台”。蔡锷在小校场成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观者如堵,聂树楷、缪桂卿、宁焕卿、李春庭、刘殿英等,也和普通百姓一起为护国军喝彩。蔡锷特别欣赏刘殿英办事理财的能力,聘请他担任随军银行行长,但此时刘殿英已经62岁,有心报国却力不从心!其长子自告奋勇替父从军人川护国,却因少不更事受人蛊惑,挪用了一大笔军费。蔡锷治军极严,欲将刘殿英长子军法从事。刘殿英在毕节得知消息,赶紧变卖家产筹措资金填补军费亏空,为长子保住了性命。一直到1928年,基督教“安息会”来毕节发展,刘殿英将“公恕堂”变卖给“安息会”作教产——“安息会”曾在“公恕堂”里办过“德生小学”——才总算还清了所欠债务。

1936年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驻扎毕节时,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政治委员王震等,就在“安息会”内办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57名开国上将中排名第一的萧克上将旧地重游,亲笔为原“安息会”所在“毕节中山路34号”题写“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15字,被制成匾额悬挂在葛重辉创作并书写的刘殿英住宅16字对联的“横批”位置!

“公恕堂”这副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刻石门联至今完好保存,只要从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门前经过都可以看到,成为毕节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传承的吉光片羽,因为得到重视和保护而熠熠生辉!

刘殿英曾多年担任毕节商会会长,是毕节城商界的领军人物。在改朝换代之际,他身体力行兴办实业——当时全城最大的粮食加工场地“刘家水碾”——可谓领导当时毕节社会风气转化之先。昔日“刘家水碾”,在今天的“人民公园”旁边。

据刘殿英后人讲,灾荒年月,老人家曾不止一次慷慨解囊,把水碾中自家积存的米粮发放给饥民。

1934年刘殿英80岁寿辰,毕节松山书院末科(1904年)十廪生之一、田坝桥犀牛塘大才子糜雅凡曾作贺联一副:度梁颢春秋,又差一岁;祝汾阳寿考,快睹六亲。

梁颢是宋初人,82岁进士及第,殿试时被宋太祖赵匡胤钦点状元,《三字经》里有“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之句;“汾阳”代指曾被封为“汾阳郡王”的唐代名将郭子仪,84岁寿终正寝。糜雅凡将文武兼备的刘殿英比附梁颢、郭子仪,虽然夸大其词,但当时刘殿英在毕节的受人敬仰,亦足见一斑。

原住朱昌白泥井的刘泽清,因为兄报仇与大方土匪结仇,来毕节找“大老爷”诉说苦情,寻求庇护。刘殿英和刘泽清同姓不同宗,却毅然出手相助,帮其在城内“砂石牌坊”附近安排了住处,并且借钱给其在大横街摆小摊养家活口。刘泽清的儿子刘熙乙,后来从十里八乡“赶溜溜场”做小生意起家,变成了民国年间的毕节首富,在贵州也属有名的大财阀。刘熙乙、刘裕远兄弟,每次从贵阳或其他地方回到毕节城,都要提了点心来松山路刘府看望“大老爷”。其父母在世时,更是谆谆告诫子女,不能忘记“大老爷”的大恩大德……

1945年,刘殿英逝世。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本报记者 吴雄 摄)

记忆里的东关坡

□ 韩一丁

在交通闭塞的年代,从东边进入毕节城区,东关坡的东安路是必经之道。每日早晨,做生意的、读书的、上班的,总是披着第一缕霞光、迎着缥缈的薄雾,浩浩荡荡地翻过东关坡,再来到双井寺车站。

这里有熟悉的老瓦房,琳琅满目的水果摊、杂货店,横七竖八的三轮车、黄包车,还有不绝于耳的吆喝声。这样,就算到城里了。进了城后,很多人还会在双井寺包子铺买个包子,再到县医院门口的(双井寺)水井里喝一口凉水,歇歇脚,就可以分道扬镳,各忙各的了。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这是一条令人向往又分外漫长的路。大人们沿着这条路早出晚归,每次回家总是变戏法般地取出我们几姊妹喜欢的零食、玩具和衣服。

偶尔,父亲要是带回几条“小金鱼”,那就是幸福感爆棚的一天了。那种逆着光,自行车把手上挂着红彤彤的金鱼闪闪发光的喜悦,似乎是其他任何礼物都无法替代的。每逢过年过节,父母总要带着我们背着背篓进城置办年货,那种满街好吃的好玩的带给我的那种味觉、视觉上的冲击力,是成年后再也感受不到了。

长大后,东关坡的东安路成了我去城里的上学路。那时坐车极不方便,因此我上学都是步行。通常天蒙蒙亮我就要起床,走很久才

能赶到学校。由于当时还没有路灯,冬天的路又湿又滑,摸黑读书的道路更加艰辛和漫长了。于是,父亲就把我姐安排在后座,我个头小就把我安置在前面的单杠上。父亲年富力强,自行车蹬得飞快,我听着他的喘息声,并紧紧贴着他的胸前,就不会感觉到冬天的冷。

有时候运气好,我会在放学路上与下班后拉货回家的父亲偶遇。上坡时,我就帮他推车;下坡时,他就把我拎起来放到车龙头上,一溜而下。那真是清风微微凉,日子暖洋洋。

小小的自行车,不仅承载了我和姐姐的上学路,还承载了那美好而温暖的回忆,让我们学会了知识、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担当。

近些年,政府加大了对旧城的

改造力度,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东关坡那条路沿线的老建筑、旧事物等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宽敞明亮的道路,美观大气的路灯再也不会再有摸黑夜行的恐惧,不过,也不会再有一个伟岸的父亲骑着自行车拉着我在街上驰骋,更不会听到早读课的敲钟声穿越晨雾而来……

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已住进了城里。我的父亲——老韩同志,今年也光荣退休,他斑驳的人生画卷即将翻开新的篇章。他依然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每天早出晚归,走过东关坡回老家种花养鱼。晨光暮霭中,他的步伐坚定而祥和,一如当年载着我东关坡上敲响的一声声清脆的铃。